



郾县乔家院春秋墓初识

冯 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06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郾县肖家河村乔家院清理了四座东周时期的墓葬,编号M3—M6。四墓均有殉人,等级较高,其中三座保存完好,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乔家院一带发现东周墓已非首次,1990年和2001年,这里分别有一座墓葬遭破坏(编号为XM和X·Y·M1,下文分别称之为90M和01M),都出土有青铜容器。乔家院诸墓的材料均已公布,各简报已对其年代、国属和葬俗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笔者在关注这些墓葬材料时,也产生了一些粗浅的认识,下面试图从几个方面论述,敬请大家指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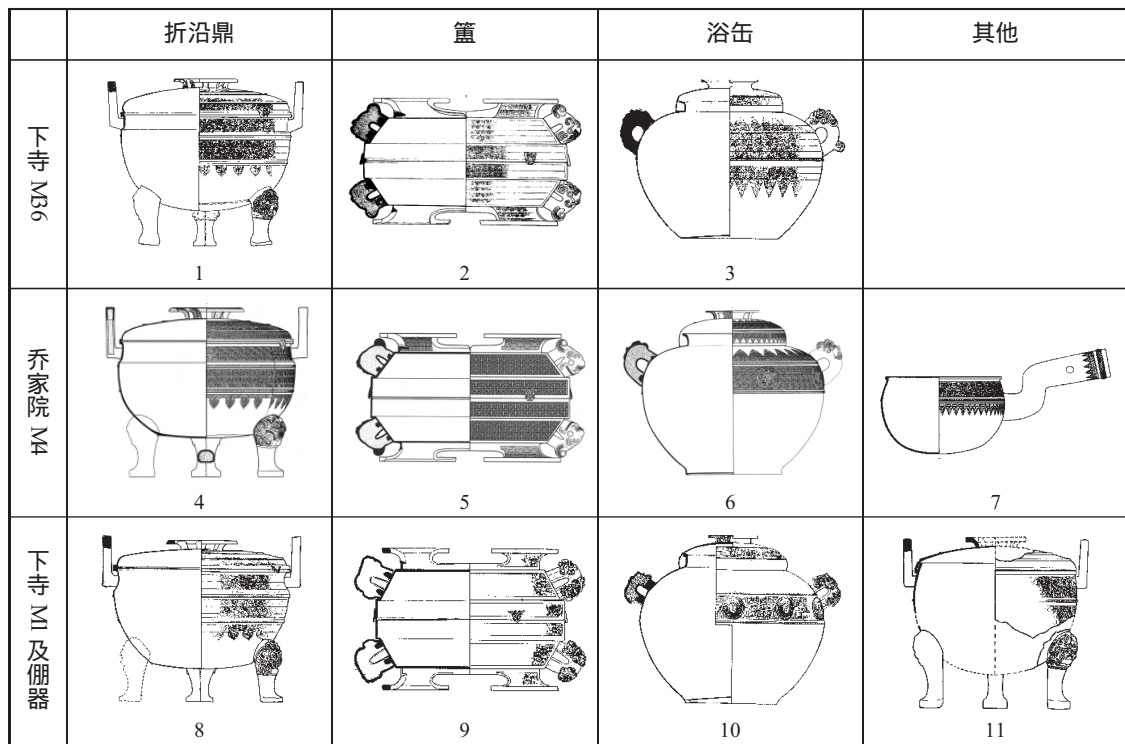
对墓葬年代和国属的判断是基础的研究工作。M3—M6的发掘者根据出土器物的特征,将它们确定为“春秋中期晚段至春秋晚期的楚墓”,90M的简报则将其定为春秋晚期楚墓。这些意见基本是正确的。只有01M的简报对其年代(春秋中期)和出土铜器国属(唐国)的判断有一些问题。可能是篇幅所限,简报对诸墓年代的推断均较为简略和笼统,由于淅川楚鬲氏家族墓群的发掘和研究,汉水流域春秋中、晚期高等级墓葬的年代序列已比较清楚,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对乔家院诸墓的年代进行较细致的推断。随葬铜器铭文上的“惕”及由此涉及的主身份问题,也有可进一步讨论之处。

笔者对乔家院诸墓年代的判断,将以淅川鬲氏家族墓群作为重要的参照和年代标尺。鬲氏墓群由下寺、和尚岭和徐家岭三处“墓地”组成。下寺“墓地”由九座铜器墓组成,《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将它们分为三期:“第一期”有M8、M7、M36,年代为“春秋中期后段”;“第二期”有M4、M1、M2、M3,年代为“春秋晚期前段”;“第三期”有M10和M11,年代为“春秋晚期后段”。和尚岭“墓地”只有M1和M2两座墓葬,徐家岭“墓地”有十座墓葬,其中

较大的墓葬有M3、M9、M10和M1,《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将和尚岭M1、M2和徐家岭M3、M9的年代定为春秋晚期,将徐家岭M1、M10的年代定为战国早期。笔者认为,两部报告对鬲氏墓群的断代基本是准确的。下寺M2墓主为楚令尹鬲子冯(卒于公元前548年)的确定,更是为墓群具体年代的判断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已知点。

乔家院六座墓葬中,M5因盗扰严重已无随葬品,不能直接断代,对其他墓年代的判断,主要依据的是出土的青铜容器。并非所有器物都有清晰的演变规律,因此在讨论时仅选取若干有代表性者。

五座墓中,M4年代最早。该墓出土的铜容器,有鼎、簋、浴缶各二,盂、斗、盘、匜各一,整体看来略晚于下寺“第一期”墓M36出土铜器,而早于下寺“第二期”墓M1、M2、M3出土器物。M4出土铜鼎(M4:1;图一,4)为折沿鼎(或称鬲),有学者指出其演变趋势之一是“从矮兽蹄足到粗壮的高兽蹄足”,春秋中、晚期该类鼎有一定数量的出土,三足确实是由矮到高,同时还有逐渐外撇的趋向。M36出土的此类鼎(M36:2;图一,1)与M4:1形制、纹饰基本相同,表明它们时代相近,但比较而言,前者三足稍矮,且近底部微内聚。再看下寺M1出土的折沿鼎(M1:62;图一,8),三足明显较细高,已稍有外撇。因此,M4:1在发展序列上位于下寺M36:2和下寺M1:62之间。M4出土的铜簋(M4:8;图一,5)在器形和纹饰上也很接近下寺M36出土铜簋(M36:5;图一,2),整体较长,器身斜壁与器口所在平面的夹角较小,兽形耳较短,装饰基本相同,矩形捉手(或圈足)较矮,器身纹饰均为细密的波带纹。相比而言,M36:5器身又显稍长。而下寺M1出土的簋,器身斜壁与器口所在平面的夹角明显增大,矩形捉手(或圈足)较高,显得器身较短、整体较高,兽形耳较长,器身纹饰为细密的蟠虺纹;这些都是较晚的特征,下寺M10和M11出土铜簋(图二,4、13)延续了这种特征。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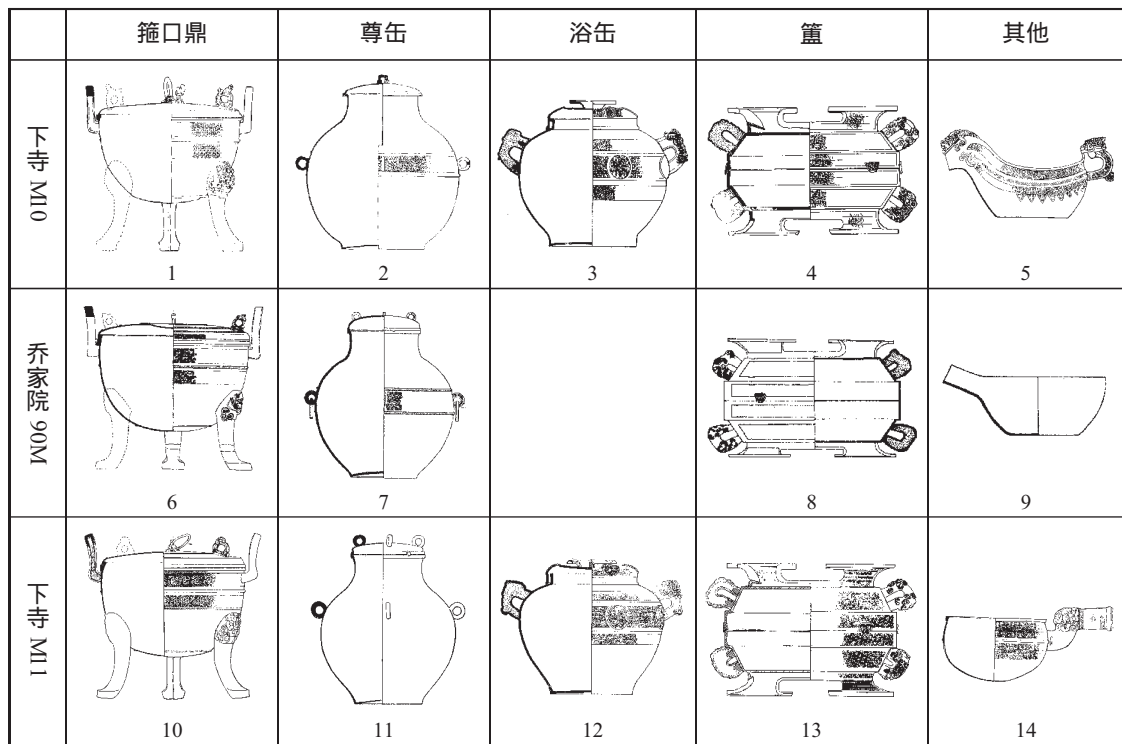
图一 乔家院楚墓和莲氏墓群出土铜容器比较图(一)

M4 8 与下寺 M6 5 基本同时或略晚,两者均早于棚簠。M4 出土的浴缶(M4:11;图一,6)同样显示了较早的特征:盖面较圆浑,无凸出的圆饰,器身则有圆饰,这与下寺 M6 出土浴缶(M6:3;图一,3)较接近,但后者器身亦无圆饰,显示了更早的特征(可与下寺 M7 出土浴缶比较);下寺 M3 出土的棚浴缶(图一,10)和下寺 M1 的孟滕姬浴缶,器盖上则已出现了凸出的圆饰;到下寺 M10 和 M11 时期,浴缶(图二,3、12)盖面出现明显的下凹,但盖缘仍保留圆饰。由上可知,M4 8 略晚于下寺 M6 5,而早于棚浴缶和孟滕姬浴缶;与它特征最接近的是下寺 M4 出土的浴缶(M4:4)^⑩,《下寺》虽将该墓列为“第二期”,但也指出其出土器物与 M6 较为接近,“可能较乙组其他三墓为早”^⑪。总之,从随葬的折沿鼎、簠、浴缶等几种器物的时代特征来看,乔家院 M4 的年代应当略晚于下寺 M6,而早于下寺 M1、M2;下寺 M2 的年代为公元前 548 年,因此 M4 的绝对年代可推测在公元前 580~560 年左右,正当春秋中期末到中晚期之际。

01M 应晚于 M4。该墓出土铜鼎^⑫口沿下有一周凸箍以承盖,即楚墓中最常见的“箍口鼎”(或称“𨮒”或“𨮒”^⑬)。春秋中晚期该类鼎的特征变化是:器盖捉手由圈柱状到兽首衔环状,后者盖缘均有

三环钮;三足越来越细高,外撇程度越来越甚,当外撇到极限时,又变为较直的细高状^⑭。01M 出土箍口鼎从整体上看与下寺 M2 出土的棚鼎(图一,11)和下寺 M1 出土箍口鼎(M1:67)^⑮相近,但与之相比,足较高,且外撇较甚,年代显然稍晚,但又要早于下寺 M10 出土箍口鼎(M10:48),后者器盖较平,已是兽首衔环捉手且盖缘有三环钮,三足更加细高且外撇更甚。楚墓中的铜盖到春秋晚期即为敦所取代,01M 和下寺 M1、M2 中均有铜盖,而下寺 M10 和 M11 则只出土铜敦。总之,01M 在年代上应要略晚于下寺 M1、M2,而早于下寺 M10,绝对年代可推测为约公元前 540~520 年。

90M 又要晚于 01M。该墓出土铜器与下寺 M10 和 M11 出土器物特征接近,箍口鼎器盖上均有兽首衔环捉手和三环形钮,三足细高、外撇程度较甚,但相比而言,90M 出土铜鼎之一(图二,6)与下寺 M11 出土的铜鼎之一(M11:3,图二,10)更为接近。90M 出土的尊缶(图二,7)与下寺 M10 出土尊缶(M10:47;图二,2)形制接近,但器身较细高、颈部较明显,盖面平均分布三个环形钮,似是较晚特征;下寺 M11 出土尊缶(M11:1,图二,11)则已具有新型特征:束颈明显,中腹鼓出,盖面和腹部各有三个和四个环形钮,整体素面,因此,90M 出土尊缶,发展序列当处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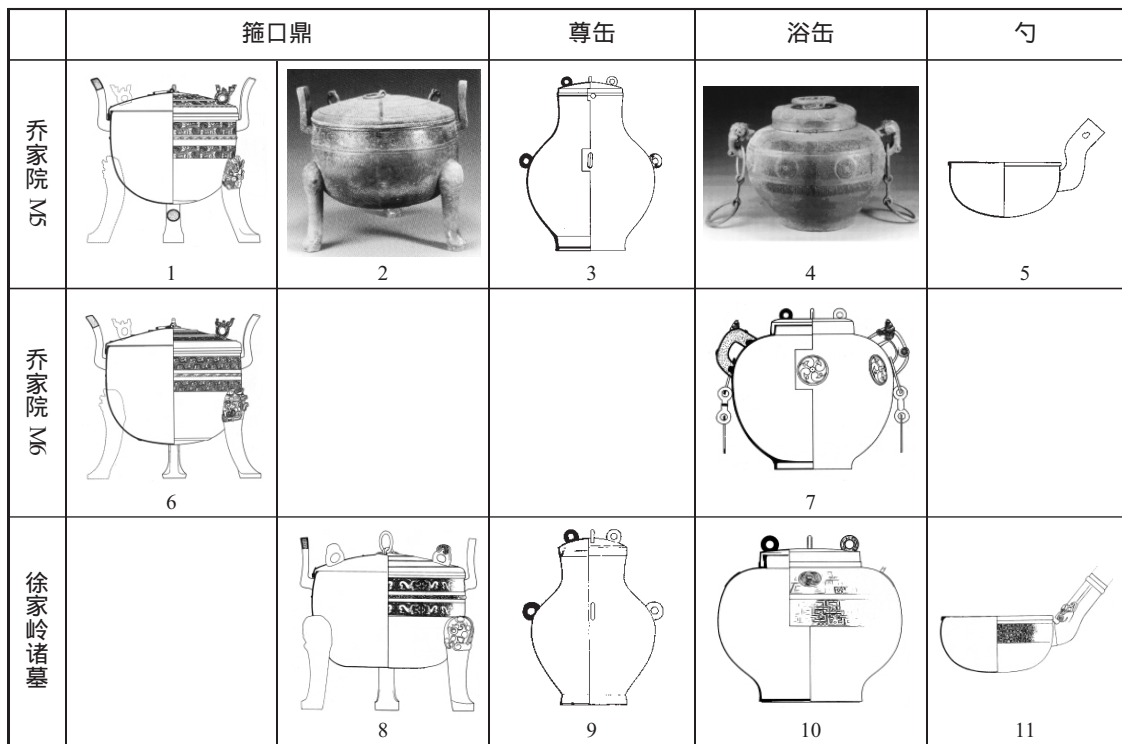
图二 乔家院楚墓和蕪氏墓群出土铜容器比较图(二)

下寺 M10 :47 和 M11 :1 之间。90M 出土铜匣(图二:9)器壁较薄、整体素面、长流不封口,这类铜匣在蕪氏墓群是从下寺 M11 才开始出现的^①,M10 出土的铜匣(M10:40;图二:2)则仍延续着前期的特征。因此,90M 年代上似应晚于下寺 M10,而与下寺 M11 较接近或略早;下寺 M10 和 M11 应该是晚于下寺 M2 的蕪氏两代男性之墓,若按正常情况 20 余年为一代的话,则可推测 90M 的绝对年代约公元前 520~500 年前后,当约春秋晚期中段。

M5 和 M6 是乔家院已知墓葬中年代最晚的两座。两墓出土箍口鼎(M5:5;图三:1;M6:7;图三:6)形制接近,相比下寺 M11 和 90M 出土铜鼎,腹部明显较深,腹壁上部相对较直;三足外撇更甚,足跟接腹处更加偏上,最上端已近中腹处^②,两附耳外撇幅度较大。这些都是较晚的特征。M5 出土的“III 式”铜鼎,箍口、底已近平、器腹较宽扁、三足直立,器身饰两周“凤鸟纹”,其形制和纹饰均与徐家岭 M9 出土铜鼎(M9:21;图三:8)非常接近,与和尚岭 M2 出土的两件铜鼎(M2:29;M2:32)^③也较为相似,这是一类新型的箍口鼎,它的出现正在旧型箍口鼎(即三足外撇者)衰落和消失之时,两者之间似有一种替代,其发生时间看来正是从 M5、M6 时期开始的。M5

出土的尊缶(M5:10;图三:3)相比下寺 M11 :1,颈部较高、近底部较直类似假圈足,这种较晚形态的尊缶还见于寿县蔡侯墓^④(公元前 491 年)和战国早期的徐家岭 M1(M1:11;图三:9)。M6 出土的浴缶(M6:10;图三:7)盖面较平,上有四个环形钮,年代显然较晚,徐家岭 M3 出土浴缶(M3:64;图三:10)器盖形制与之近似,到战国时期这种器盖的缶也很常见。M5 出土的“斗”(即“无流勺”,M5:1;图三:5)器腹较浅,与其形制相近者均出于较晚的墓葬中,如和尚岭 M2、徐家岭 M9(M9:39;图三:11)等,而年代较早的乔家院 M4 和下寺 M11(M4:5;图一:7;M11:12;图二:4)出土铜斗,则器腹较深。总之,M5 和 M6 的年代均应晚于下寺 M11,与和尚岭 M2、徐家岭 M3、M9 的年代比较接近或略早。和尚岭 M2 已出现战国时期常见的铜圆壶,墓中出土“十四年”编钟也被学者考证为楚惠王十四年(公元前 475 年)所作^⑤,因此其年代当为春秋末年,徐家岭 M9、M3 与之基本相当,若然,则乔家院 M5、M6 的年代当在公元前 490~前 470 年前后,若以笔者主张的公元前 453 年为春、战分界的话,已是春秋晚期偏晚,若以公元前 476 年为春、战分界的话,则最晚可能已到春、战之际。

综上所述,乔家院五座墓葬年代均为春秋时期,



图三 乔家院楚墓和蘧氏家族墓群出土铜器比较图(三)

最早的 M4 年代为春秋中期末到中晚期之际,最晚的 M5 和 M6 已为春秋晚期偏晚。

在明确了乔家院墓群的年代,再来看其国属。从墓葬年代和出土器物特征来判断,墓葬均应为楚墓,发掘者也持有如此意见。但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楊”的问题。01M 曾出土“楊子中”器三件,其中两件器主为“楊子中瀕儿”,当时的简报^②认为“楊”即为“唐”,几件器物属“春秋中期的唐国铜器”,对墓葬国属未给予明确的说法;“楊”和“唐”两字确实相通,但若说“楊”一定是唐国却无绝对证据。现在, M4 铜戈上又发现有“楊子戕”铭文,暗示“楊”可能与墓主有着较密切的关系,简报于是认为“‘楊’应为国属”,“可以确证,出土于同一墓地的‘楊子中瀕儿’和‘楊子戕’应有亲缘关系,这一发现对于深入研究墓葬族属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③。但问题是若以“楊”为国属,而乔家院“墓葬族属”又与“楊”有着密切关系,那么何以将它们定为楚墓?简报并未说明。笔者认为有如下两种可能:其一,“楊”确为国名,但此时或已亡,遗族内附楚国,或未亡,因受楚影响较大,墓葬内涵已同于典型楚墓;其二,“楊”并非国名,而是氏名,应为楚国“楊”氏。“楊”可能为国名,但应与“唐”无关,唐在春秋中、晚期之际到晚期

偏早尚存在,其地望虽无定论,但其势力范围却不太可能到如此偏西的地方。若为氏也不无可能,楚有阳氏,《左传》昭公十七年:“吴伐楚,阳句为令尹。”杜预《注》:“阳句,穆王曾孙,令尹子瑕。”阳句之后有阳令终(《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阳”,《世本》作“扬”,或许“楊”跟楚阳氏有一定关系。“楊”若为氏,则“楊子戕”这种名字格式可以解释为类似“蘧子冯”一样的楚臣之名,只是就目前所见春秋金文而言,“某子仲(叔、季)”这类称谓中的“某”基本还都是国名而非氏名。因此,究竟“楊”该怎么理解,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目前看来,根据墓葬内涵将乔家院诸墓定为楚墓还是较为合理的。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楊”字铭文的两座墓葬,即 M4 和 01M,是年代明确的五座墓葬中最早的两座,可能有所意味。还有,汉代汉中郡有杨县,在今湖北省白河县城一带,东去乔家院仅 20 余千米,“杨”和“楊”两字显然也是相通的,或许有所联系。

二

本节主要讨论乔家院墓葬等级、性别和有关葬俗方面的问题。

乔家院保存完好的三座墓葬,均具有较高的等

级。三墓均随葬 2 鼎、2 簋、1 盘、1 匜。M4 有 2 浴缶，M5、M6 则各有 2 尊缶 1 浴缶。这种随葬铜缶上的差别，是一种时代差异。下寺楚墓中较早的 M7 和 M36 均随葬 2 件浴缶而无尊缶，与乔家院 M4 的情况相同，较晚的 M1、M2、M3 和 M10 则是尊缶和浴缶各 2 件；再晚的 M11 随葬 2 尊缶 1 浴缶，已与乔家院 M5、M6 的情况相同。因此从随葬铜缶的组合情况，也可看出墓葬年代的早晚。总之，根据随葬铜器的数量和种类，排除时代差异，可以说乔家院三墓的等级是基本相同的。90M 尽管被破坏，但仍确定有 2 鼎 2 簋 2 尊缶，当与前三墓规格相当。01M 目前可知有鼎、簋各一，尽管可能因破坏而组合不全，但该墓墓室面积较小，规格可能稍低。M3 随葬品已失，墓口面积小于 M4 等三墓，略小于 90M，却远大于 01M，等级也应不低。

至于墓主性别，发掘者根据 M3、M6 “多见装饰品而未见兵器和佩剑”，推测两墓分别与 M4、M5 形成两处“夫妻异穴合葬墓”。将 M4、M5 定为男性墓、M3、M6 定为女性墓，应该问题不大，但说 M5 和 M6 是“夫妻异穴合葬墓”，就未必有确证。根据目前对东周楚墓的认识，若墓葬为东西向，则夫妻异穴合葬一般为两墓南北并列，下寺、和尚岭蒧氏家族墓均是如此；乔家院四座墓葬均为东西向（详下），M3 和 M4 南北并列，可能是夫妻合葬，M5 和 M6 却是一东一西，不像是异穴合葬。

再看墓葬的方向。M3~M6 四墓墓向在 58~79 度间，基本属东西向墓，墓主头向东，这与目前所见的多数春秋时期较高等级楚墓的墓向是基本一致的。01M 也为东西向。90M 墓室破坏较严重，简报作者经分析推测其“南北长约 4.5、东西宽约 2.5 米”，似为南北向，暂时存疑。曾有学者对楚墓的墓向进行过考察，指出“楚墓中规格较高的墓的墓主头向尚东，而规格较低的墓葬头向尚南或头向复杂”^②。情况确实如此，尤其是春秋楚墓，更加明显。如淅川蒧氏家族墓群春秋时期诸墓绝大多数墓向在 68~90 度间；只有较早的 M8 和 M7 两墓，墓向分别为 110 和 125 度，但仍属东西向，只是偏南而已。当阳曹家岗 M5 墓向 94 度，虽被盗，仍在陪葬坑中清理出 4 鼎 2 簋^③。南阳市西关三座墓葬均随葬有鼎、簋等铜器，墓向 88~95 度间^④。麻城李家湾 7 座铜器墓中有 6 座墓向在 80~98 度间^⑤。但随葬铜容器的春秋楚墓墓向亦多有南向者，如襄阳山湾 M6、M33 等 8 座墓^⑥、团山 M1^⑦、

枝江姚家港 M14^⑧、当阳赵家湖 ZHM8、JM9 等 9 座墓^⑨，这些墓有些等级要高于南阳西关、麻城李家湾诸墓，但随葬容器最多者也不过 2 鼎 2 簋，如团山 M1、姚家港 M14、山湾 M6 等。山湾 M6 年代与乔家院 M4 基本同时，除鼎、簋外，还随葬有浴缶二、斗、盘、匜各一，却没有盂；姚家港 M14 晚于 M4 而略早于 01M，只随葬一件浴缶；团山 M1 略早于乔家院 M5、M6，随葬两件尊缶，却没有浴缶和斗。由此可知，春秋时期的南向楚墓，等级最高者也要略低于乔家院三墓；尽管春秋楚墓的墓向与等级并无严格关联，东向墓未必一定比南向墓规格高，但南向墓却有着等级上限，随葬铜容器均不超过 2 鼎 2 簋。

殉葬现象是乔家院楚墓的重要发现。M3~M6 各殉葬一人，其中 M4 殉人以一棺为葬具，位于主棺北部略偏西处；其余三墓殉人皆无棺，横置于墓主脚端，头向有北有南。在乔家院三墓发掘前，有殉葬现象的东周楚墓共发现二十余座。笔者曾对它们进行过考察，结论是：“楚国殉葬墓集中于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规格普遍较高，均为东西向，有墓道的位于墓室东壁，墓主头向基本都是东，殉人数量不多，一般为 1 或 2 人，基本都置于墓主棺、椁之间，葬具基本都是一棺。”^⑩ 乔家院三墓的情况与笔者的上述认识是基本符合的，只是其中三个殉人无棺。还有必要讨论一下墓葬等级与殉葬现象的关系。楚国殉葬墓的规格普遍较高，是无疑的，但具体什么规格的墓葬才会有殉人呢？由于时代的不同会造成墓葬规模的差异，在具体分析时以随葬铜容器的多少来标识墓葬的规格可能更为合理。上文已经提到，乔家院三墓均随葬 2 鼎 2 簋，由于年代差异，分别随葬 2 浴缶和 2 尊缶 1 浴缶。蒧氏墓群春秋中、晚期主墓（包括夫人墓）中，除了下寺 M36 和和尚岭 M1 因盗扰或破坏严重无法确认外，普遍发现有 1 或 2 个殉人，规格基本都高于乔家院三墓，只有下寺 M7 随葬 2 鼎、2 簋、2 浴缶、1 盂，等级与之相当；下寺 M2、M1 的“陪葬墓”M3（或认为墓主为另一夫人）也殉葬一人，但它随葬 5 鼎 4 簋，规格很高。其余春秋中晚期的楚国殉葬墓，有的规格要高于乔家院三墓，如当阳曹家岗 M5（4 鼎 2 簋），有的虽因盗掘严重随葬品所剩无几，仍可根据其他线索判断其规格甚高，如当阳赵巷 M4。上文已指出，东周时期楚国殉葬墓“均为东西向墓”、“墓主头向基本都是东”，似乎墓向与殉葬现象的有无有某种联系，但实际还是一个等级

的问题。首先,东向墓未必均有殉人,如麻城李家湾和南阳西关诸墓,均为一鼎墓,下寺“第二期”的M4也只随葬一鼎一簋,规格均不高;其次,南向墓均无明确的殉葬现象存在^③,如襄阳山湾、当阳赵家湖诸墓,但南向墓“有着等级的上限”,最多不过随葬二鼎二簋,整体看来规格略低于乔家院三墓。可以说,乔家院三墓与下寺M7是已知的春秋楚国殉葬墓中等级最低者,随葬二鼎二簋^④。总之,殉葬现象在春秋时期楚国特定等级墓葬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作为殉葬墓的等级下限,乔家院三墓某种程度上具有“标尺”的意义。

关于殉人,尚有值得注意之处。M3殉人骨架旁有铜削、砺石等物件,应是殉人的殉葬品;M6殉人骨架东侧也有铜削、陶纺轮、带钩等物件,从位置上看也应为殉人所有。春秋时期这种殉人随葬铜削的现象,在淮河流域的殉葬墓中多有发现。如莒南大店M2中共殉10人,其中两人各随葬一件铜削^⑤;临沂凤凰岭M1共殉14人,其中5人各随葬一件铜削^⑥;邳州九女墩M6殉5人,其中1人随葬铜削和砺石,另有三人各随葬一件铜削^⑦;固始侯古堆M1殉17人,其中一人随葬一件铜削和2件陶纺轮,另有多人随葬有陶纺轮^⑧。秦墓中也有发现,如凤翔西沟道M3各有一殉人随葬一件铜削^⑨,任家嘴墓中一殉人左手握两件铜削^⑩。殉人的随葬品对考察他们的身份有着重要的作用,尽管目前还无法确知殉人随葬铜削等器物的含义,但仍可作为一个线索留待今后的研究中去解决。

乔家院楚墓在墓向、随葬品和殉葬现象上与其他地区楚墓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随葬品摆放位置上。M3~M6均有边箱和头箱,随葬品多置于边箱中,与墓主之棺大致南北并列,这种情况在已知的其他地区春秋楚墓中还未见到(随葬品都置于墓主头端或头箱中),可能是当地墓葬的特色,这倒与淮河流域春秋墓葬有一定的相似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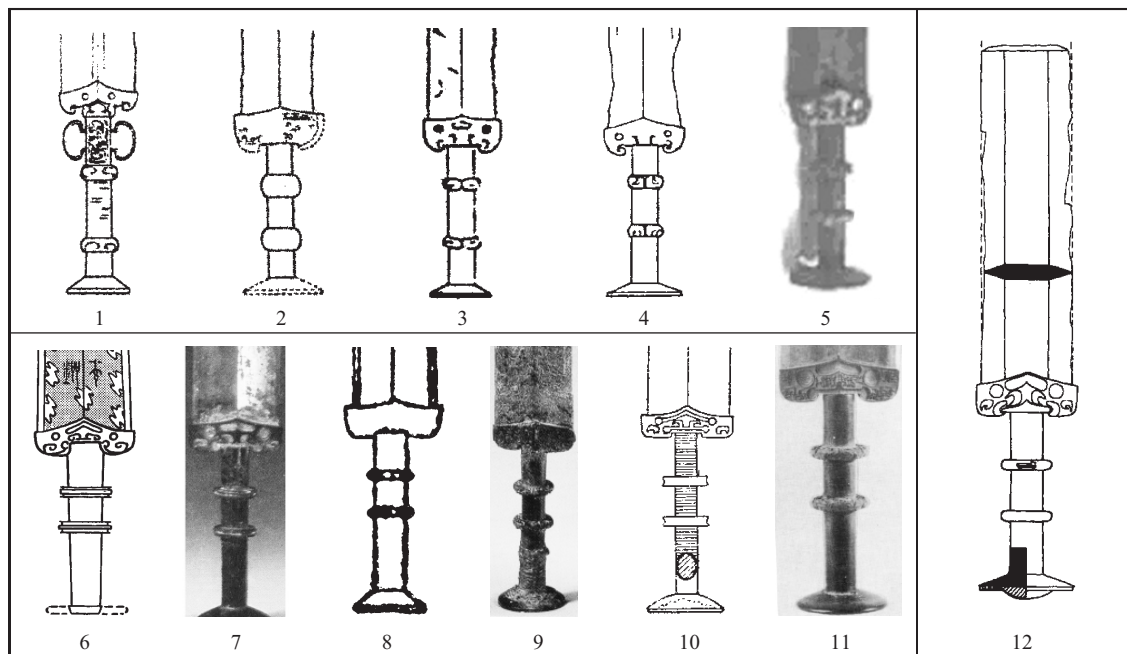
三

上文笔者经过论证,将乔家院M4的年代定为春秋中期末到中晚期之际,约公元前580~560年,如果所定年代准确的话,M4出土的一柄残断的铜剑(M4:23,图四:12)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该剑剑身上半部残缺,平脊,横截面呈扁六边形,倒“凹”形格,格上镶嵌绿松石;圆茎,茎上有两

道箍,首呈喇叭形,底端中部有一浅半球形凸起。这类宽格、圆茎、茎上有箍的铜剑(以下简称“有箍剑”)是东周尤其是战国时期常见的一种剑,即林寿晋先生所定的“东周式铜剑”中的III式^⑪、李伯谦先生所定的“中原地区东周铜剑”中的D型^⑫。林寿晋先生已经指出,该类剑在中原地区的出现最早也是在春秋晚期,他举的例子是洛阳中州路M2729出土的一柄(图四:10)^⑬,M2729年代为春秋晚期中段,仍是已知的中原地区出土“有箍剑”的墓葬中年代最早的一座。乔家院M4发掘前,在南方典型楚墓葬中,“有箍剑”的出现也不早于春秋晚期。现在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进展,我们已经知道“有箍剑”不是春秋晚期才出现的,也非中原地区和楚地的产物,它可能是起源于吴越地区的一类铜剑。但吴越地区出土的该类剑,由于缺乏可靠的标尺,具体时代往往难以断定;比如屯溪诸土墩墓,学界对其年代的判断,最早可推到西周时期,最晚则已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分歧巨大,因此诸墓中出土的“有箍剑”的年代就很难确定了。吴越所产“有箍剑”年代明确者,最早也不过春秋晚期,如吴王光和吴王夫差所铸的几柄。因此,不晚于春秋中、晚期之际的乔家院M4:23铜剑是已知的年代明确的“有箍剑”中最早的一柄,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若以之与年代较晚的“有箍剑”进行比较,或可根据其中形制特征的差异来探讨该类剑的演变规律。

细察年代明确的春秋晚期有箍剑,如吴王光剑(图四:6)^⑭、吴王夫差剑(图四:7)^⑮、徐王义楚之元子剑(图四:8)^⑯和越王者旨於赐剑(图四:9)^⑰等,就会发现它们形制上的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特征:茎上两箍位置偏上,两箍间距(两箍间茎长)明显小于箍首间距(下箍与剑首间茎长)。战国时期的有箍剑延续了这一特征,如战国早期的越王州句剑(图四:11)^⑱。但年代较早的乔家院M4:23却有着不同的特征,其茎上两箍间距与箍首间距相差并不大,前者只是略小于后者;而且与上举诸剑相比,剑格较宽、茎相对较粗(主要相对格长而言)。很容易想到,这几点差异可能是因时代不同造成的;但若仅据M4:23一剑就下此结论,又有孤证之嫌。笔者恰好找到一个旁证,即桐柏月河M1出土的一柄剑(图四:5)^⑲。该剑与M4:23形制接近,两箍间距与箍首间距相差也不远,格较宽,剑身均为平脊。月河M1从形制上看并非典型楚墓,其年代与M4基本同时或稍晚^⑳。两



图四

1.屯溪 M3:010 2/2 2.屯溪 M4:21 3.屯溪 M8:1 4.屯溪 M7:1 5.桐柏月河 M1 北坑:3 6.吴王光剑 7.吴王夫差剑
8.徐王义楚之元子剑 9.越王者旨於赐剑 10.洛阳中州路 M2729:20 11.越王州句剑 12.乔家院 M4:23

墓年代既相差不远,所出铜剑具有相似特征就似乎不是偶然现象了。因此,将 M4:23 与上举春秋晚期后诸剑之间的差异理解为一种时代差异是合理的。

带着上述认识再来看屯溪土墩墓出土的铜剑^⑤。屯溪共四墓(M3、M4、M7、M8)出土“有箍剑”,屯溪 M3 所出的一柄(图四:1),形制古朴,茎上有三道箍,偏上两箍间有一对蘑菇形耳,表明其年代较早^⑥;三箍中最上一箍与格相连,实际已无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偏下两箍,其间距要远大于箍首间距。屯溪 M4、M8 和 M7 出土的三柄剑(图四:2、3、4),茎上均有两箍,M4、M8 所出剑两箍间距大于箍首间距,M7 所出剑两箍间距则略小于箍首间距。相比春秋晚期后的“有箍剑”,屯溪四剑两箍间距明显较大、格相对较宽、茎也相对较粗,根据上文推测,都应是较早的特征;比较中还发现一点差异,即屯溪四剑茎箍均较粗,这也可能是时代较早的表现。与乔家院 M4:23 相比,屯溪 M3、M4、M7 所出三剑两箍间距大于箍首间距,年代可能早于前者,M7 所出剑两箍位置特征则基本同于 M4:23,年代可能较接近。

上文所涉及的“有箍剑”,可根据其形制特征串成这样一个序列:屯溪 M3 剑——屯溪 M4、M8 剑——乔家院 M4:23、月河 M1 剑(屯溪 M7 剑?)

——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等。这个序列应是一个年代由早到晚的序列。“有箍剑”的演变规律也可大致推测为:格由较宽到较窄,茎由较粗到较细,茎上两箍也由较粗到较细;两箍间距由相对较大到相对较小,箍首间距则相反。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推测即使成立,也不会是绝对的,晚期的某些铜剑可能具有某种看似较早的特征,其时代性还需要从整体上来把握。

下面以铜剑的讨论为契机谈谈屯溪土墩墓的年代问题。屯溪诸墓的年代过去多被认为可早至西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已经主张春秋说,不久前出版《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李国梁主编)更是根据对出土的铜剑等兵器的年代判断将墓葬时代定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⑦。笔者认为屯溪诸墓的年代上限早不到西周^⑧,但也并不同意《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的意见^⑨;根据上文铜剑的大致断代,屯溪诸墓中年代最晚的 M8 和 M7 也不会晚于乔家院 M4,即不晚于春秋中、晚期之际,因此屯溪土墩墓应为春秋早、中期的墓葬。

值得注意的是,在乔家院 M4 中,除了铜剑外,还有一个铜矛头(M4:19),也是公认的典型的吴越式兵器。该类矛头和“有箍剑”在墓葬中成组合的出

现,也不乏其例,在屯溪土墩墓和春秋晚期吴越地区墓葬中都有发现。M4中“有箍剑”和铜矛头的出现,说明了吴越文化影响在该地区的存在。一般认为,春秋中、晚期以后,中原地区和楚地出现的吴越文化因素,是公元前584年或稍早晋使巫臣通吴的后果。若然,则乔家院M4是已知的中原地区和楚地受吴越文化影响的墓葬中较早的一例;鄢县一带位于楚西部山区,距离吴越地区还很远,因此其间广大区域,尚可期待更多的相关发现。

注释: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鄢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年第4期。

a. 鄢阳地区博物馆:《湖北鄢县肖家河春秋楚墓》,《考古》1998年第4期。b. 鄢县博物馆:《湖北鄢县肖家河出土春秋唐国铜器》,《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1976年,乔家院还发现数十件青铜器,但下落不明,见黄凤春:《湖北鄢县乔家院春秋墓地》,国家文物局主编:《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李零:《“楚叔之孙棚”究竟是谁——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111~11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简报(注1)和《下寺》称之为“纤细的蟠虺纹”,似不确。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下寺》,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4页,图二六。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下寺》,文物出版社,第68页,图五七。

⑪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下寺》,文物出版社,第244页,图一八一。

⑫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下寺》,文物出版社,第319页。

⑬ 鄢县博物馆:《湖北鄢县肖家河出土春秋唐国铜器》,《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图三。

⑭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114~11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⑮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116~11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⑯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下寺》,文物出版社,第53页,图四三。

⑰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下寺》,文物出版社,299页。原器因壁较薄,破碎严重,具体形制不明,但推测应与90M出土的匝相近。这种盘、匝的变化,并不适用于所有墓葬;一些年代较晚的大型墓葬,如寿县蔡侯墓、固始侯古堆MI和曾侯乙墓,仍有较早类型的铜盘、铜匝出土。

⑱ 朱凤瀚先生曾论及楚式带盖鼎足部演变规律,结论是年代越晚足跟越上移,见其所著《中国古代青铜器》,第900~90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⑲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和尚岭与徐家岭》,大象出版社,第29页,图二七;第31页,图二八。

⑳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图版拾壹,科学出版社,1956年。

㉑ 赵世纲:《鄢子受钟与鄂国史迹》,《江汉考古》1995年第1期。

㉒ 鄢县博物馆:《湖北鄢县肖家河出土春秋唐国铜器》,《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㉓ 杜林渊、段熔:《试论楚国墓葬的头向》,《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3期,2006年。

㉔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㉕ 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西关三座春秋楚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㉖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麻城市李家湾春秋楚墓》,《考古》2000年第5期。

㉗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㉘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阳团山东周墓》,《考古》1991年第9期。

㉙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湖北枝江姚家港高山庙两座春秋楚墓》,《文物》1989年第3期。

③①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③② 冯峰：《东周殉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16页，2005年。

③③ 这里之所以提到“明确的殉葬现象”，是说在春秋楚墓中尚有一墓两人的情况，如山湾 M19、团山 M1 等；但却不是明确的殉葬而更可能是合葬，两人并列而葬，看不出尊卑，尤其是团山 M1，从出土铭文及随葬品放置情况来看，应是夫妻合葬而非殉葬。

③④ 已近春秋末年的当阳赵家湖 LM8 也似有一个殉人，但该墓只是个陶器墓，等级不高。“殉人”偏于南侧，骨架和棺均较小，应该是个儿童，是否真正的殉人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③⑤ 山东省博物馆等：《莒南大店春秋时期莒国殉人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③⑥ 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编：《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齐鲁书社，1987年。

③⑦ 徐州博物馆等：《江苏邳州市九女墩春秋墓发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9期。

③⑧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③⑨ 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第3期。

④⑩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任家嘴春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3期。

④⑪ 林寿晋：《东周式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④⑫ 李伯谦：《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文物》1982年第1期。

④⑬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④⑭ 年代在公元前514~前496年间，山西原平峙峪出土，《文物》1972年第4期，图版貳。

④⑮ 年代在公元前495~前473年间，古越馆藏，《文物》1993年第4期，彩色插页一。另山东邹县出土一柄，形制相近，见胡新立：《山东邹县发现一件吴王夫差剑》，《文物》1993年第8期。

④⑯ 湖北襄阳蔡坡 M4 出土，见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图十五：3。

④⑰ 旨者於赐即越王与，约公元前464~前458

年在位，故宫博物院藏，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青铜器》，器267，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④⑱ 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子陵岗古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0年第4期，图版貳：9。州句即朱句，约公元前448~前412年在位。

④⑲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等：《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图十五：2，《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

⑤⑩ 墓中所出鼎、壶、匜等年代较早，但浴缶、盘则较晚。浴缶器身上有凸起的圆形饰而器盖上则无，特征与乔家院 M4 出土浴缶相同，盘也与 M4 出土铜盘形制接近。墓中出土的部分玉器与 M4 和下寺 M1 较为相似，尤其是玉虎形饰与下寺 M1 所出者更是近同。若依据年代最晚的器物断代的话，则月河 M1 应与 M4 基本同时或稍晚。简报定为春秋晚期前段，基本正确。

⑤⑪ 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⑫ 这种带耳的特征可以追溯到浙江黄岩小人尖和瓯海杨府山等早期土墩墓中所出铜剑，古越阁所藏的一柄短剑也与小人尖、杨府山同类，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其与屯溪 M3 这柄剑之间的关系，见李学勤：《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文物》1993年第4期。

⑤⑬ 李国梁：《从青铜兵器看屯溪土墩墓的年代》，《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附录二。

⑤⑭ 屯溪 M3 出土的内壁有龙纹的高体铜盘，在中原地区墓葬中的出现不早于春秋早期。林已奈夫先生认为中原地区该类铜盘的出现是受长江流域影响的结果（林已奈夫：《关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若干问题》，马承源主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笔者有不同意见；即便确如林先生所说，那么两地铜盘年代亦应基本同时。

⑤⑮ 就铜剑而言，既然属于同类（有箍剑），那么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会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不能根据这些大致特征的相近就断定它们年代相当，有时时代差异往往体现在一些细部特征上；只有在掌握一定材料的基础上，做较细致的排比，才有可能把握其时代特征。



本期导读

一.《鄢县乔家院春秋墓初识》

冯峰《鄢县乔家院春秋墓初识》是对湖北鄢县发现的四座东周墓葬的个案研究,对墓葬的国别、族属、等级、年代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作者从器物的形态、文字和特殊器形的分析入手,提出了与前人研究不同的观点,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论据充分、论点稳妥,图文并茂,是一篇有意义的学术论文。

二.《徐州汉代夫妻合葬墓初论》

刘尊志《徐州汉代夫妻合葬墓初论》是对汉代特殊丧葬习俗——夫妻合葬的个案研究,以徐州为中心,在选题上具有典型意义。在研究方法上以考古类型学为基础进行了合葬墓的形态分析,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的等级制度,并从社会伦理、礼仪制度等角度进行了具体的解释。提出了这一特殊葬俗的发展估计及在汉代的具体表现及成因。文章证据充分、论点中肯,也有创新,是一篇有价值的考古学研究论文。

三.《江西六朝墓葬综述》

韦正《江西六朝墓葬综述》对考古发现的180余座江西六朝墓葬进行了资料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分期,并与周边地区的长江下游和中上游六朝墓葬进行了比较,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了江西六朝墓葬的特殊性,分析江西独特的墓葬文化形成的原因。

本文在选题上弥补了以往对江西六朝墓葬研究的不足,对资料的整理也比较全面客观,尽管在分析墓葬的文化内涵上有待进一步深入,但仍不失为一篇有价值的论文。

四.《江西地区宋代墓葬的分期研究》

吴敬《江西地区宋代墓葬的分期研究》是一篇区域性墓葬研究论文,对材料丰富但以往关注较少的江西宋墓材料进行了资料整理,主要采用传统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进行了分析和分期,并试图从社会史、经济史的角度对江西宋代墓葬文化进行分析。本文对材料的收集较为全面、适用方法稳妥,虽然对与墓葬密切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缺乏更深入的探讨、对墓葬的精神内涵也少有涉及,但仍不失为一篇有意义的基础研究论文。

(李梅田)